

脏象概说

盛 增 秀 王 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脏 象 概 说

盛增秀 王 琦



00625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023516

脏象概说

盛增秀 王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43,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0

书号：14119·1464 定价：(科四)0.63元

目 录

上篇 总 论

第一章 概说	1
第二章 脏象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3
一、脏象学说的形成	3
二、脏象学说的发展	6
三、研究脏象学说的意义	10
第三章 脏腑的基本性能	12
第四章 脏象学说与整体观	14
一、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上的整体观	14
二、整体观在诊断和防治上的重要意义	20

中篇 各 论

第一章 五脏	24
一、心(附: 心包络)	24
二、肺	27
三、脾	31
四、肝	36
五、肾(附: 命门)	41
第二章 六腑	52
一、胆	52
二、胃	54
三、小肠	56
四、大肠	57

五、膀胱	57
六、三焦	58
第三章 奇恒之府	62
一、脑和髓	63
二、骨	64
三、脉	64
四、女子胞	65
第四章 脏腑之间的关系	67
一、脏与脏	67
二、脏与腑	73
三、腑与腑	76
第五章 精、神、气、血、津液	77
一、精	77
二、神	79
三、气	80
四、血	82
五、津液	84
六、精、神、气、血、津液的相互关系	85
第六章 饮食、水液的生化	88
一、饮食的转化、输布和排泄	88
二、水液的代谢与调节	89
第七章 脏腑与神志活动的关系	92

下篇 脏腑的发病机理和证治要点

第一章 脏象学说是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	94
一、脏象学说与病因学的关系	94
二、脏象学说与诊法的关系	96
三、脏象学说与各种辨证纲领和方法的关系	97
四、脏象学说与治法的关系	99

第二章 五脏的病证	101
一、心的病证	101
二、肺的病证	108
三、脾的病证	115
四、肝的病证	123
五、肾的病证	133
第三章 六腑的病证	139
一、胆的病证	139
二、胃的病证	141
三、小肠的病证	147
四、大肠的病证	149
五、膀胱的病证	154
六、三焦的病证	156
第四章 奇恒之府的病证	156
一、脑的病证	156
二、女子胞的病证	160
第五章 脏腑兼病	170
1. 心肺气虚	170
2. 心脾两虚	171
3. 心肾不交	172
4. 肺脾两虚	173
5. 肝火犯肺	174
6. 肺肾阴亏	175
7. 肝脾不调	176
8. 肝胃不和	177
9. 脾肾阳虚	178
10. 肝肾阴虚	179
11. 肝胆湿热	180
第六章 气、血、津液的病证	182
一、气的病证	182

二、血的病证	185
三、气血同病	189
四、津液的病证	191

附篇 有关脏象实质的研究

一、有关脾的实质的研究	195
二、有关肾的实质的研究	199

上篇 总 论

第一章 概 说

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和历代医学家从长期生活、医疗实践以及对人体解剖初步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比拟、推演而概括出来的理论，是中医基本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脏象”一词，首见于《素问·六节脏象论》。它的含义：脏，就是人体的内脏；象，即象征和形象。王冰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也说：“脏居于内，形见于外。”由此可见，所谓脏象就是指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映于人体外部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客观地反映了内在脏腑的机能变化，从而作为推论或断定脏腑机能变化趋向的依据。因此可以认为，祖国医学的脏象学说，是一种通过观察人体外部征象来研究内脏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脏象主要包括五脏、六腑、奇恒之府和精、神、气、血、津液等方面。至于经络，因为它亦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也属于脏象范畴，但它另具一套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经络学说），故本书不作系统讨论。

脏象学说是在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以五脏为中心，以心为主导，通过经络联属关系，把人体各部分组成为一个既分工又合作并与外界环境相通的有

机整体。脏腑之间的内在平衡协调，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整体统一，是机体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因此，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转归，主要和脏腑的功能状态有密切关系，体现了祖国医学在病理、生理方面有机联系的观点。脏象学说贯穿在祖国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剂、药物、预防等各个方面，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显然处于重要地位。这一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而且在今天的医学科学研究以及临床实践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祖国医学所指的脏腑，除了指实质脏器外，更主要的是概括了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种种反映，与现代医学同名的实质内脏相比，对其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等方面的解释，则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它所说的“心”，除了指循环系统的功能外，还包括神经系统的某些器官功能。因此，我们学习祖国医学的脏象学说时，不能机械地把现代医学的“脏器”与中医的“脏象”两种概念等同起来。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祖国医学在过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以致很多问题没有能够得到进一步说明。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学习脏象学说，必须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对它进行历史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加以提高，使中西医关于脏腑（器）学说的两套理论，通过实践，逐步融会贯通，形成一套崭新的理论，为发展我国的新医学、新药学作出贡献。

第二章 脏象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一、脏象学说的形成

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对自然科学包括对人体自身的认识是浅表的、笼统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脏象学说正是我国劳动人民与古代医家长期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一）长期的生活观察。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现象：有些身体虚弱的人，平时畏风怕冷、容易出汗，也极易受邪致病，古人通过对这些客观现象长期观察，分析总结，逐渐认识到“卫气”分布于肌表，它有“温分肉，肥腠理，司开阖”和防御外邪的作用。又如思虑过度往往使食欲减退，即使勉强进食亦不易消化，于是祖国医学把情志活动的“思”与脾的生理功能联系起来认识，故有“脾主思”、“思虑伤脾”的论点等等。（二）反复的医疗实践，从病理现象推论出生理功能。例如当人体感受风寒，初起邪在肌表，可出现鼻塞、咳嗽、或气急等症象，通过对这些病理现象的反复观察，逐步认识到皮毛、鼻等组织器官，与肺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认识到咳嗽、气急等常与肺有关，从而推论出“肺合皮毛，司呼吸，其声咳”等论点。脾胃虚弱，消化功能不正常的人，常表现为四肢倦怠无力、形体消瘦、肌肉不结实，而湿邪侵脾也会出现四肢沉重、肌肤浮肿等症状，这些病理变化，就是“脾主四肢”和“脾主肌肉”的立论依据等等。（三）解剖实验。解剖生理学的知识，是医学中最基本的知识，如果完全不了解人体构造和生命现象而试图有效地战胜疾病，保障人类的健康，那是难以想象的。我国解剖生理学的发源较早，从殷墟出土的

甲骨文来看，早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前已有“耳”、“目”、“口”、“鼻”、“首”……等多种人体器官的名称，说明当时早已因为人体器官的部位不同，作用互殊，确立了专用名词。《史记》就有俞跗用割腹治疾的记述，该书扁鹊仓公列传载：“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麋、镵石拆引、案拭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俞跗之事虽无可考，但这段记载反映古代有的医生能操解剖，这是可以证实的。后来在《内经》里对解剖人体观察脏腑更有详细记载。《灵枢·经水篇》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说明解剖是按照一定的要求，有计划进行的。《灵枢·肠胃篇》还记载了解剖实例：咽门“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指出人体食道长度与大小肠长度比例约一比三十五，与现代解剖测量结果相近似。《素问·刺禁论》还明确指出：“藏有要害，不可不察，……刺中心，一日死，……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刺脊间中髓为伛，……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刺膺中陷中肺，为喘逆仰息……。”假如当时不具有相当解剖生理学知识，要写出如此正确的文献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内经》初步认识了血液循环，不仅论述了血液的生成、性质、功能以及造血、贮血器官，而且对血液循环的来源、经过脏器的部位、速率均作了描述，实为我国古代医学的伟大贡献。较之《内经》成书稍晚的《难经》对有些脏腑都记有大小、长短、容积、重量等具体数字，尤为难得。以上所述，充分说明了脏象学说是建筑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医疗实践和解剖实验三方面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解

剖只能看到人死后的脏腑组织形态，而活着的生理病理活动和变化那就要在活体上进行观察。因此除了解剖方面的观察外，尤其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到的“生理变化”和治疗实践中所观察到的“病理征象”，便成为脏象学说形成的重要客观基础。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受着一定的哲学指导的。脏象学说的形成诚然有着上述的客观基础，但它之所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与古代朴素的辩证法——阴阳五行说分不开的。成书于约公元前三世纪的我国第一部医学著作《内经》，正是沿用阴阳五行说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等方面。因此《内经》的成书是脏象学说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内经》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都起源于内脏的功能。内而消化循环，外而视听言行，无一不是内脏活动的表现，所以内脏活动的实质，就是人体整个生命活动。《内经》所涉及的脏象内容非常广泛，它包括了内脏的形态和功能；脏器与脏气之间，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营卫气血，精神津液的生成、功能及其循行，以及人的生长、衰老、死亡过程中的发展变化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而这些论述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说理工具的。《内经》指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人体整个生命的始终，是矛盾双方的概括。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再就物质对功能而言，凡内脏的实质，精血津液等都属阴，而脏腑的功能活动属阳等等。总之阴阳的属性是相对的，但是阴阳又有着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的互根关系，所以脏与腑，气与血，内脏与体表，物质与功能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中医学

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由人体阴阳两个对立方面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所致，亦即脏腑功能发生紊乱的结果，所以治疗疾病，就应致力于调整脏腑阴阳的偏胜偏衰，使之恢复正常状态。五行学说除了用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分别归类各个脏腑以及与脏器相关联的组织外，并运用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论来阐述人体生命活动和病理表现，所谓“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即是说明人体各个脏器在正常或病理情况下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应该承认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对脏象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指导的作用。

二、脏象学说的发展

脏象学说自《内经》之后，又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史。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历代医学家在《内经》的基础上，对脏象学说作了不断充实和提高。从解剖生理学的进展来看，《汉书·王莽传》记载了太医尚方利用处死后的尸体进行“剖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筭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的史实。太医、尚方都是医学人员，竹筭就是竹篾、竹丝，导脉就是通血管，这些例证反映了当时的解剖是为了医学的需要。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就能应用全身麻醉进行腹腔等外科手术，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剖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象这样的外科手术，如当时没有一定的生理学解剖学知识是不可能办到的。宋代宋慈所著《洗冤录》为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它与基础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临床学科的外科、骨科等都有着密切的

关系。法医专著的问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医学在上述方面的辉煌成就。宋代范缜《东斋记事》等书记述了吴简编的欧希范五脏图，亦系根据人体解剖，尸体实物描绘而成，到崇宁间杨介存真图不仅改正吴图之失，其精确度也有超过，虽原书现已失传，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书却记载了有关内容。该书说：“存真图一卷，右皇朝杨介编，……郡守李夷行遣医家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肓，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介校以古书，无少异者，比欧希范五脏图过之远矣，实有助于医家也。”明高武《针灸聚英》卷一和杨继洲《针灸大成》卷六中的内脏图都说明引用杨介存真图一书而编绘的。针灸学发展是需要以解剖生理知识为基础的，与杨介同一时代的王惟一制作的针灸铜人模型，对此作出了新的贡献。据宋周密著的《齐东野语》中说：“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输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这种“脏腑无一不具”的人体模型设计，无疑反映了当时解剖知识水平。清《洗冤录详义》一书，还反映了解剖学特别是骨学的成就。作者许梿在《全身骨图》注中说：“梿历官山左、江南，凡遇会检人命重案必带同画匠，将所检骨殖详细摹图，随时修改，务求十分尽善而止，及今二十余年方敢定准此图。”难怪对骨学有许多新的发现。他如清初孙星衍的《释人体》，沈彤的《释骨》等著作，又都是想把解剖学专门化的可贵例子。特别是清代《医林改错》作者王清任，明确指出：“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亲自到刑场观察尸体脏器，还进行动物解剖以作比较，同时虚心向别人请教有关器官的结构情况，历四十多年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还写出有关生理解剖方面论述五篇。今天看来虽然尚存错漏，但对人体脏腑认识，较之前人大有进步。例如他正确地记述了横膈膜

是身体上下界物，其上只有心肺，其余脏器均在其下；对于肺脏也改正了古人认为肺下有二十四个行气孔和气管直入心脏的错误，并发现了气管有两个分支和支气管；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人体的主要动脉（卫总管）、静脉（营总管）的分布情形；同时还纠正了古人认为肝有七叶的说法等。不仅如此，他还亲手进行动物实验，他因出水道的不明，“后以畜牧之，遂喂遂杀之畜，网油满水铃铛，三四日不喂之畜杀之，无水铃铛。”其动物实验应该说是中国解剖生理的首创，对解剖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更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脏腑生理特点及脏腑病変发展规律的认识，后世医家在《内经》的基础上，更有重大发挥。如后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明确提出了以脏腑经络为理论核心的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大大丰富了脏象学说的内容，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概括杂证，作为立法处方的依据。宋代《小儿药证直诀》作者钱乙，根据脏象学说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五脏相胜相乘的“五脏证治”的治疗体系，《医学纲目》称它是扩充《内经·脏气法时论》的要旨，发前人之所未发。嗣后，许多医家如张洁古、万密斋、王肯堂等对五脏证治都有进一步发挥，如张洁古根据脏腑虚实寒热的辨证方法，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给后世处方用药提供了不少方便，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金元时代李东垣著《脾胃论》，强调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在《内经》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人以脾胃中气为本”的观点，充实了治疗脾胃病的方药，被后人称为“补土（脾胃）派”的创始人。明代张景岳、赵养葵等对肾阴肾阳的生理、病理及治疗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李梴《医学入门》指出了“脑者髓之海，诸髓皆属于脑，故上至脑，下至尾

髓皆精髓升降之道路也。”说明大脑与髓神经相通。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基于《内经》“头者，精明之府”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揭示了大脑是精神、思维活动的发源地。清代叶天士、吴鞠通在诊治温热病的实践中所创立的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纲领进一步发展了脏象学说，尤其是充实了脏腑病变证治的内容。王泰林对五脏中的“肝”颇有研究，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治疗肝病的方法，足资后人参考。唐容川所著《血证论》一书，虽专论血证，但对血气关系和脏腑发病机理等问题都有一定发挥。举凡这些，足以说明祖国医学的脏象学说源远流长，丰富多采，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和医学家智慧的结晶。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脏象学说的发展，劳动人民许多创造性的见解，非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使之逐步提高，相反备受摧残，而封建礼教、伦理观念又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绳索。如在魏晋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影响下，南朝沛郡相县（今安徽濉溪）有个人叫唐赐，饮酒得病，吐虫二十余条，临终时嘱妻子张氏把尸体解剖看一下，唐赐死后，张氏遵照遗言作了解剖，其子唐付也未干涉。反动统治者得知此事后判处张氏“伤夫五脏”行为不道，唐付“不孝”，母子二人均以违反封建礼教而惨遭杀害。相反，历代统治阶级，把医学作为他们推行“仁政”的工具。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中提到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女性的叫“幽闭”的虐刑，“那种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科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用确凿的事实对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医学残害人民的罪行加以无情的揭露。特别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中医事业更横加扼杀摧残，使祖国医学濒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以致脏象学说的应用和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研究脏象学说的意义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祖国医学如枯木逢春，获得了新生和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脏象学说被广泛地应用于教学、科研，并在指导医疗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九六二年，湖北省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发表的“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评价了脏象学说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对开展脏象学说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以对祖国医学“肾”的研究而言，上海第一医学院脏象研究组十多年来对一些不同疾病进行肾阴肾阳的研究，从临床疗效及各项检验指标，探索异病同治的物质基础，如该组对几种不同疾病（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妊娠毒血症、红斑狼疮、冠心病、神经衰弱、硬皮病）有肾虚表现者，用调补肾阴肾阳的方法进行治疗提高了疗效。同时，发现肾虚患者的红细胞糖酵解与氧化强度有差异（肾阴虚组比正常值高，肾阳虚组比正常值低），经调补肾阴肾阳的药物治疗后，红细胞的糖分解代谢恢复正常，提示该类药物有调整能量代谢的作用。随后又发现肾阳虚患者的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较正常值低 $\frac{2}{3}$ ，经补肾治疗后，均有所提高；并通过促肾上腺皮质试验，初步认为肾阳虚的实质是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低下，而应用温补肾阳治疗可提高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兴奋性。随着中西医结合的深入开展，许多单位对肾的实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如肾与内分泌尤其是垂体-性腺之间的关系；肾与植物神经机能的关系；肾与能量代谢变化的关系，以及近年发现肾与免疫机制方面的关系等。再从对